

目 录

民国时期的杭州民族工商业概况·····	闵子	(1)
解放前的杭州工商行业·····	本会文史编辑室	(10)
1911——1937年的杭州商业市场·····	董涤尘	(38)
清末民初杭州湖墅的商业情况·····	陈鼎文 于学勤	(49)
杭州中山中路一条街·····	童宝泰 陈瑞芝	(58)
现代杭州丝绸工业·····		
·····	杭州市民建、工商联文史组	(79)
杭州的绸业市场和绸庄·····		
·····	杭州市民建、工商联文史组	(96)
杭州丝绸业中的几家有名企业·····		
·····	本会文史编辑室	(109)
与杭州丝绸业有关的几个行业·····		
·····	本会文史编辑室	(119)
杭州土丝业的兴衰·····	胡贤熹	(140)
民生药厂简史·····	王雪痕 黄士扬	(145)
1949年前的杭州电厂·····	陈晴岚	(164)
回忆中华书局杭州分局·····	朱朗亭	(169)
杭州国货陈列馆·····	杨积武 姜继心	(175)
杭州亨得利钟表店·····	姜继心	(179)

张允升线帽百货庄·····	沈长富 徐天庵	(184)
杭州最早的市内公共汽车·····		
·····	杭州市民建、工商联文史组	(188)
杭州历史上的土纸行业·····		
·····	倪昌龄 魏轩民 冯大森 施炳芳	(191)
杭州南北货行业简史·····	方志高	(196)
编 后·····		(200)

民国时期的 杭州民族工商业概况

闵子

杭州是浙江的省会，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东南各省的交通枢纽之一，工农业产品的集散地。杭州的西湖风景秀丽，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现在是全国的重点风景旅游城市。

自隋统一全国，开凿了江南运河以后，杭州的经济文化逐渐发展。明代已出现靠雇工剥削的“机户”。在1896年甲午战争后，拱宸桥一带被日本帝国主义划为租界，开辟商埠，从此杭州的民族工商业便遭到了帝国主义的摧残。辛亥革命后，铁路、公路交通日渐发达，民族工商业有所发展，东南各省以及本省内地的丝、茶、米、木材等工农业产品，直接运到杭州，再由水陆公路运往上海等地。往来客商多起来，春秋两季的游客络绎不绝，杭州就成了浙江的政治经济中心。

一

杭州的丝绸工业远在南宋时已初具规模，设有织造院。明末清初改为织造局，专掌织造，供应宫廷之需。当时杭州

的丝绸已负盛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我国的侵略，因此杭州的民族工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1912年规模较大的振兴绸厂和纬成缫丝厂相继成立。1915年天章绸厂首先采用了电力织绸，这是丝绸生产上的一大进步。与此同时，原料亦由纯丝改为掺用各种纤维交织，花色品种日渐增多。当时杭州的电机有200台左右，手拉机则在5000台以上。1926年为历史上最好的一年，全市织机约1万台以上，成品内销东北、华北、广东，外销法国巴黎、里昂和南洋各地。震旦丝织厂就在这一年创办起来的。

1929年以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加剧了对中国的侵略，加上国内连年战争和水旱灾害，农村破产，民族工商业呈现了历史上未有的萧条衰落。自1928年至1929年2月，杭州绸厂停机歇业的有虎林、立新昌、绮新、巨纶、天章、立昌等35家。绸机停歇的从4007张减至1104张，停歇机数为2903台。绸货生产率下降三分之二。1932年，丝绸年产量仅49万匹，比过去减少三分之二。1934年以后，生产逐步恢复，至抗日战争前夕，杭州丝绸厂有140多家，机坊4000多户，共有电力织绸机约8500台，手拉织绸机约5000台，月产绸缎约62000匹。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全市共有电力织绸机4000多台，平均每月用丝每台约70余磅，年达350万磅。除三分之一由政府配给人造丝，其余都自行采购蚕丝及其他纤维。以木机和铁机织造绸缎的机户，抗日战争胜利后复业的有2200户，至1946年仅剩1500多户。原因是由于原料缺乏，资金短绌，染炼不精，品质复杂，实销不振，因此恢复较为困难。

杭州除丝绸工业发展较早外，其他工场手工业大都在鸦片战争到同治年间（1840—1874）先后发展起来的。如制作杭州摺扇的舒莲记扇庄，制作各色雨伞的小禅堂雨伞作坊，制作杭剪的张小泉近记剪刀作坊，制作扑粉及蛋形擦粉的孔凤春香粉作坊等。此外，染织布业在宣统年间（1909年—1911年）已有生产，但多系小型家庭手工业；1916年左右，有手拉布机和铁木机近千台。就在这个时期，杭州的棉纺、火柴、造纸等轻工业，亦都改用铁机生产，因此铁机业也随着发展起来。

杭州市四郊的农户，大都栽桑养蚕，由于丝织工业生产技术上的改进，恃丝业为生计的人就多起来。丝绸原料、原料加工、丝绸成品加工等行业亦应时而生。以经纬丝料工业来说，系家庭手工业，分捻丝合丝、络丝、摇纬、整经等部，俗称络经与料房。抗日战争以前，全市有100多家，每家雇工15—20人，以此为业的约1万人。到1946年，已不到十分之二。与此有关系的还有制作丝线闻名的手工作坊。据估计在那个历史时期中，直接或间接依附丝绸为生的，全市约有10万多人。

二

解放前杭州这个消费性城市的商业，主要由如下的三大类构成：经营茶叶、木材、山货、炒货等土特产的，约占全市商业的18%；服务于游客、香客、山客、水客的服务性行业约占23%；一般商业约占59%。

杭州是浙江茶叶贸易市场之一，除本省所产的茶叶外，安徽、福建、江西等省所产的红绿茶，大都在杭州销售或由

杭州出口。抗战前每年销售茶叶在12万担以上，远销英国、美国、北非及南洋等地。抗战期间，茶区大部沦陷，茶园荒芜，茶厂倒闭，茶叶损失极为严重，产量仅及战前的十分之二三。以杭州狮子峰、龙井、云栖、虎跑所产之龙井绿茶而言，1946年前后，年产毛茶只有600多担。杭州又是木材的吐纳口，因此杭州的木业成为重要商业。浙东所产木材，均编成木排，顺钱塘江上游各支流而下，集散于杭州的江干，每年由这里运销各地的木材价值达四、五万两。抗战胜利后，全市木行商业达126家。杭嘉湖是浙江的主要产米区，而邻省的粮食调节，都以杭州湖墅珠儿潭为集散地。抗战以前每日平均到货——以米为主，豆为副，约七、八十船，每船自百担至二、三百担不等。日伪占据时期，粮食市场交易陷于停顿。抗战胜利后，在湖墅营业的粮行约20余家。杭州市经营土产业的，有山货与炒货两业。山货业以采运笋干、箬叶和茶叶等货为大宗。箬叶年产约5万担，杭州经营的占十分之三，其余运销上海，苏州等地。笋干在杭州运销的约5千担，除销售杭州、嘉兴、湖州等地外，还远销北京、天津、东北等地。炒货是以门售香榧、山核桃、藕粉、熏香豆为大宗，战前山核桃年产达1万担以上，主要销杭州及沪杭沿线的城市与乡镇。经营以上行业的很多是行家，他们除了抽取佣金外，有时还在收购和代购，业务上凭借旧势力，把持操纵，剥削农民。

服务于游客、香客和一般往来客商的服务性与消费性行业，每逢春秋季节及香汛期间，业务特好，相传为“三冬靠一春”。解放前，杭州的旅馆业是生意兴隆的。其中以西湖区的西泠、大华、新新、蝶来四家专做外国旅客及达官大贾

的生意；市区以清泰第二旅馆为上等，房间最多，具有水汀装置。抗日战争胜利后，杭州的旅馆共有140家。民国初年，城站与新市场开辟，各式菜馆先后开设，规模较大的如楼外楼、太和园、天香楼等；一般的菜饭店也很多。1946年共有菜馆73家，菜饭店180家。杭州的茶馆也是一个大行业。解放前茶肆林立，以湖滨的望湖楼，吴山的绿荫茶榭等几家规模较大，夜间都设有歌场。湖上别业如水竹居、坚匏别墅；各胜点如平湖秋月，西冷印社；寺观如虎跑、韬光等处，都有卖茶处。1946年共有160多家。

在一般商业中，杭线、杭粉、杭烟、杭剪、杭扇，称为“五杭”，曾兴盛一时，名噪全国。据不完全统计，杭州的百年老店有二、三十家，其中如方回春诚记国药号，据资料记载，开创于1649年；张小泉近记剪号，开创于1628年，都有300多年的历史。

三

抗日战争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杭州的民族资产阶级怀着很大希望，纷纷集资，修理房屋，添置机器设备，计划经营，重整旧业。可是不到半年，却在官僚资本和美帝国主义的势力下，受到了新的摧残。美帝国主义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和国民党沆瀣一起，展开了经济上的掠夺。借美国的“剩余物资”和“救济物资”之名，以公开的或走私的方式，打进国内市场，致使国产工业品严重滞销，存货堆积，生产陷于停顿，民族工业遭到致命打击。为有利于美货的倾销，有利于官僚资本的套取外汇，国民党制

订了“低外汇政策”，这不仅摧残生产，且扼杀了我国的出口贸易。

这个时期，杭州市场也是美货充斥，国产品销不出去，民族工商业走投无路。如牛乳业竟杀掉了四分之一的奶牛，其余的亦大多转到农村去作耕牛。战前日产鲜乳3000磅的西湖炼乳公司，被迫改制锭子油；最后终于倒闭。美国香烟大量倾销，占杭州市场销售量的80%以上，使杭州的5家烟厂由减产而倒闭。美国卷烟纸的大量进口，华丰纸厂的卷烟纸就大量的积压在仓库里。

美货不仅夺去了我国国内市场，而且极力排挤我国丝茶等特产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生丝出口数惨跌，茶叶大批积压。同时工业原料如美棉、人造丝、烟叶等却源源而来。杭州市棉织品的生产，有60%用的是美棉和印度棉。而美棉与人造丝都控制在官僚资本的“中蚕”和“中纺”公司之手，限制配给；私营工厂不得已只有购买黑市。那时杭州市的丝绸工业不是忙于生产，而是为贷款和配给原料而奔走呼号。杭州的民族工商业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由于国民党的所谓“币制改革”，带来了恶性通货膨胀，因此企业的生产资金大量消耗，产品售出以后补不进原料，造成虚盈实亏。加以捐税繁重，使工商业的流动资金更加短绌，而银行资金转向投机，不再提供生产资金的借贷，因而不得不忍受高利贷的盘剥。杭州当时的利率，月利竟高达9分至1角8分。不少企业处于职工工资与日常开支也难以维持的境地，被逼得走投无路而纷纷倒闭。如杭州丝织工业，在1948年仅有机坊1300户，绸厂600多家，铁木机6000多台，估计全年产量只有50万匹，仅占战

前的五分之二。当时300多家布厂中，开工的不过十分之二，产量不及战前的十分之一。茶厂开工的，不及战前的四分之一。具有较大规模的武林烟厂，因资金亏耗殆尽而宣告闭歇。

在解放前的最后几年，民族工商业已奄奄一息，而投机性的行业却畸形发展。为投机服务的银行、钱庄却增加到62家，服务性的旅馆、菜馆等行业增加到2260家，占商业总户数的22.7%。当时的黄金、白银、粮食、棉纱成了主要的投机对象。纱布厂放弃了生产，进行纱布的囤积投机，以商养工。那一时期的工商业情况被概括为三句话：“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机”。粮食业也不顾民食的需要，大量囤积居奇，激起了市民的公愤，从1946年到1948年，先后发生了三次全市性的打米店的风潮。

四

解放前的杭州是一个消费性城市，因此商业在经济上占有很大比重，其中服务性行业又占整个商业中的相当比重。在解放前的11910户工商业中，工业仅2904户，占24%左右；商业有9006户，占75%左右。工业分散落后，设备简陋得可怜。如在机器铁工业中，除了大冶等四、五家能够仿制绸机、布机外，其余都只能从事一些修配业务。商业却拥有一个很大的摊子，其中服务于游客、香客、山客、水客的服务行业有2046户。至于供应城乡或工业需要的商业，如煤油等等，不仅为数寥寥，而且都是买办性的，为外国洋行倾销；而销售生产工具的商店，却一户

也没有。

从杭州的丝、绸、棉纺、茶叶等工业来看，无论在原料供给和产品销售上，很大程度上都依附于洋商买办或封建地主而生存的。如原材料销售上，丝绸业有44%是依赖意大利、日本进口的人造丝；棉纺业有60%依赖美国、印度的棉花。其他如火柴的原料氯酸钾，造纸原料漂白粉和纸浆等，都要依靠外国供给。而绸缎、茶叶等产品，则又以外销为主，内销部分也是以官僚地主为主要对象。民族工商业对外国的依附性，从一些行号的名称和商标上也可以体现出来，如解放前的70家新药店中，就有22家以“中美”、“中法”、“中英”等作店号。

民族工商业同时也受封建统治阶级的控制，作为官僚资本的附庸。在1914年，杭州机器铁工业创办最早的武林铁工厂，由于受到封建官僚投资的大冶铁工厂（1920年）的排挤，业务一落千丈。这也说明民族工商业如得不到官僚资本的支持就遭到失败。杭州民族工商业与封建势力的渊源关系还表现在对企业的投资方面。一些较老的商业企业如胡庆余堂国药号、宓大昌烟号、高义泰布店，以及酱酒业的“十大家”等，都是由官僚地主创办的；很多工业企业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除了经营工商业，还开设钱庄控制市场。

正由于杭州是一个消费城市，因此居间商多，投机性大，对上海的依附性也大。杭州作为居间行业的有蚕行、丝行、茶行、粮行、木行、山地货行等20多个行业。这些行家一般都没有资金，依靠代客买卖，坐收佣金。并在价格、运输等方面，从中操纵垄断，买空卖空，牟取暴利。杭州以

买空卖空为经营手段的纱布号，在市场上的影响很大。此外从事其他经营的，不论是工厂、商店，都不在乎商品的成本，只希望能掌握市场物价的变化而进行投机。不少行业，如五金、百货等的货源大都来自上海，因此价格随“申盘”而涨跌。上海的部分工商企业，在杭州设立分支机构，杭州较大的厂商，也在上海建立了“申庄”，并利用对讲电话随时探听上海行情，施展各自的经营手段。

由于处在那样一个历史时代和我国所处的历史地位，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所走的道路是坎坷曲折的，要求发展就更加困难。作为消费性城市的杭州民族工商业，也逃不出这样的命运。

这份史料是根据熟悉这方面情况的同志们的回忆，以及现存资料整理而成，只是粗线条的画出一个解放前杭州民族工商业的轮廓而已。

解放前的杭州工商行业

本会文史编辑室

杭州被誉为“天堂”，西湖风景秀丽，既是游览胜地，又是一个消费城市。杭州的工商各业都是随着这个城市的特点而相应发展，因此城市的工商业布局既具有与其他城市相同的共性，但也有其自身的特点。

抗日战争杭州沦陷时期，工商各业深受敌伪摧残，幸存者亦濒临破产。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与杭州市政府先后复员，处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局者认为“世难渐纾，一切安定，庶几百端具举，而工商亦不难并进”。当时的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曾这样说过：“工之利在生产，而生产视供应为赢绌；商之利在供应，而供应视生产为盈虚。无工则商无所运其技，无商则工无所致其用。”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杭州市商会会长金润泉动员全市工商业者或从外地将企业迁回杭州，或迅即筹备恢复企业生产，使杭州经营趋于繁荣。

据1945年杭州市商会的调查，当时杭州市工商业共分26类，113个行业。在解放后的1949年底，杭州市工商联筹备委员会接收的杭州市同业公会共有126个，其中商业公会115个，工业公会11个。会员1万多家。有了较大的变化。

这里我们将1945年的调查材料作了较系统的整理，类目照旧，提供参考。

金融业

银行 杭州市银行事业，创始于清光绪33年的浙江兴业银行。民国以后，除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均设有分行外，商业银行年复增加。1920年成立银行公会，1930年改组为银行业同业公会。1937年冬抗战军兴，大部份停业。抗战胜利后呈准国民党财政部，领到营业执照复业或新设者，至1947年8月止，有国营6家，省营、市营、县营各1家，商业15家，均加入中央银行所办的票据交换所，并与银业联合交换票据。放款对象颇殷实，除江海银行受总行影响停业外，各家业务均极稳健。此外设有四联浙江分处，由张忍甫担任主任委员，其目的在集中四行两局的力量，进一步协助政府推行金融政策。

钱庄 杭州市钱庄的性质，有汇划与贴兑之别。汇划庄以向各地汇划大宗款项及放款为主；贴兑则除放款外，兼营门市兑换，亦与外埠往来。战前有钱庄65家，复员后经财政部批准给照者，有钱业公会旧会员26家，战前未入会的钱庄8家。各庄业务，以稳放为主，均能略获盈余。杭州市的钱业公会成立于清季，组织严密，规模完备；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3月恢复成立。以后还组织实务研究会，业余进修社，并创办钱业小学。

保险 保险是近代专门业务之一种，其业务包括水、火、人寿、信用、意外、运输等。杭州市战前以外商保险公司业务为盛，其后华商急起直追。抗战胜利后，凡执有前工商部实业部执照，或曾向经济部登记的保险公司，方得注册营业。已入公会的总公司及代理处已有26家。各会员公司接受水火等

保险生意，除依保险法、保险业法施行法外，其保价照苏浙皖京各省市火险保价规则、火险实价施行办法、以及中国棉花保价规率等条款办理，赔款由公证评断。战后房屋缺乏，房产货物价值增高，业主对于保险颇为关心，故业务发达。

典当：典当在抗战前杭州原有19家，战后因当帖利息及典当开支，超过当货之月息，人民又往往当后无力取赎，又因服装式样不时更换，使满货销路呆滞，经营者得不偿失，故并无一家复业，仅新设二、三家而已。

交通业

运输 杭州市为沪杭、浙赣两大铁路线衔接之处；京杭、沪杭、杭徽、杭嘉、杭甬、杭桐公路起点；钱塘江水运通浙东、皖南，内河通浙西苏沪。交通线密如蛛网。各地的土产外运，及上海之进口货输入，均以杭州为集散地。因此杭州的过塘运输事业发展较快；范围亦大，大多自备运货汽车，或与汽车及货车公司订约联营。对于客货的起卸驳运，报关纳税，保险押运，都派员迅速稳妥办理。有的甚至供给客商膳宿，代为垫款，服务周到。因此虽铁路办理营业所后，运输业业务仍未衰落。过塘与运输分隶于两个同业公会，但过塘业大都兼营运输。

汽车 杭州市汽车事业，除官营的省公路局行驶各路线的长途客货车外，商营公共汽车有2家，出租汽车有13家，另有运输汽车，及汽车材料行业。行驶各路线载运客货，组有同业公会。

轮船 杭州市的轮船业，因水位关系，在杭州湾吨位较

大的轮船不能进口，故钱塘江的杭桐、杭诸、杭萧三线，及内河的杭沪、杭苏、杭湖等线，均用小轮搭载客货。在钱塘江上游桐庐以上，水路逐渐淤浅，则多用民船转驳，最远可达江山、常山。

民船 杭州濒钱塘江下游，襟江带湖，运河横贯其中，城南面江十里称江干，为钱塘江出入咽喉。城北沿运河曰湖墅，为嘉、湖、松贸易孔道。距湖墅三里之拱宸桥，旧为商埠地，曾盛极一时。胜利后情势稍有变迁，但赣东、皖南、闽北及浙东的土产，仍赖钱塘江运输到江干为集散地。其水浅之处，非民船不可。民船开船亦有定期，价格较低，为平民所欢迎，故航船营业，并不因公路运输而稍衰。战前杭州内河钱江的船只很多，战时损失浩大，复业入公会者仅140余艘。同业公会的业务为整理航线，分配船只，并设有货运服务部。

小货车 杭市之小货车创始于民国17年，屡经改良，仿照老虎车式样，配以汽车轮胎，车身轻，运货便，能载重，成为运输之重要工具。胜利后经杭州市工务局核定，以1200辆车额为限。

三轮车 杭州三轮车商业同业公会，于1947年2月4日成立。有公司18家，私人车行10余家，共计有车190多辆。

自由车 杭州市的自由车业，较为发达，加入公会的有189家。业务除销售欧美进口的自由车及车胎零件，修理喷漆外，并出租车辆。为防止逃跑租车，由公会统一编号，用硬印号码标识。

人力车 杭州市人力车业，在胜利以后，整顿车辆，辅助市区交通，行旅称便。惟因材料不断涨价，而车租未能比照增

加。因此业主亏负甚巨，陷于朝不保暮之境。全市人力车行达251家，资本总数3亿7千多万元。

轿埠 杭州在清季，出行代步多用肩舆，除自备外，大多临时向轿埠雇用。民国以来，舍舆用车，逐渐凌替，惟在西湖风景区游览者仍多雇舆代步。轿埠埠夫除抬轿外，并兼作埠头挑夫或作迁居者的搬运工作，因此人都称他们为“答应埠头”。

文化业

报社 杭州市的报社事业，肇始于光绪年间的日商《杭报》，其后为《杭州白话报》、《全浙公报》、《之江日报》、《大浙江报》等，均为一时之俊。战后发行的报纸有《东南日报》等10家。除《工商报》、《儿童时报》各有其独特之风格外，其余均为一般性报纸。以《东南日报》发行的历史较久，销数也较大。《工商报》由《浙江商报》、《浙江日报》改组合并，在工商界有广大读者。组有报社业同业公会。理事长为娄子匡。

书籍文具 杭州经营书业的，以售旧藏善本书为多，但营业不盛，故大多兼售杂志、小说及文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都设分局，售本局出版本并兼营文具。文具业一部份兼营纸业亦有兼营杂志书报的，但业务均甚平淡。入公会的有67家，资本额除各书局外共3700万元。

印刷 杭州市的印刷事业，颇为发达，经营铅印、石印、铸字、装订的近百家。有机器190余部，工作人员逾3千人。以印刷报纸、书籍、帐表、单据、名片为多。近以印刷材料成本日昂，而工人工资依据浙江省社会处生活指数发给，规

定于每月业务终了始发表指数表，以致难以预计成本。且各家资金都不丰厚，如果银钱业不予贷款周转，就很难维持。

纸业 纸业系经营白报纸、道林纸、牛皮纸、绘图纸等洋纸为主要业务。门市则兼售文具及土纸、笺纸、帐册、楹联宣纸、油纸等。以供给本市为多。

土纸 土纸业，以经营运销浙省各县土产之屏纸、黄烧纸、草纸等为主要业务，除销售本市外，大宗均出运至苏、沪、平、津各地，营业很大。

笔墨 杭州市的毛笔烟墨业，战后因原料飞涨，又因学校多采用钢笔蓝墨水，以致营业清淡，维持为难。全市同业17家，资本在5百万元以上的，只有石爱文、邵芝岩两家，业务也以此两家久负盛誉而较好。

裱画 杭州市为东南文物荟萃之区，书画碑帖藏于民间至伙，故裱画装璜，较为发达。裱工精致，有绫锦绢纸之分，经营此业的有40多家，组有公会。

饮食业

粮食 杭州市的米市中心，在湖墅珠儿谭，凡沿运河而来的米船都停泊在这里。在交易未成之时多泊大关，成交后则在米行码头起卸。西贡洋米则由铁路装运。湖墅米行的营业，以客米为限。正大米行的历史最久。米行分大袋行，专营本城业务；小袋行，专做绍属业务。组有公会。粮食店业，则除向米行转批外，并自向嘉兴、吴兴、芜湖、九江、无锡等地采运。以米为主，豆为副，专供零售门销本城市民。亦组有公会。另有以米舂制年糕并兼营糕团的，业务以冬季为盛，共有60余家，自组公会。以宋恒兴最负盛誉。